

## 《乾隆南巡圖》卷四〈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河防工程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趙元熙

### 摘要

南巡可謂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在位時（1735-1795）的大事，其中一個目的，是對運河沿岸之水利與河防工程進行視察。位於江蘇淮安府的清口與高家堰地區，自清初以來一直都是治河防洪之重地，皇帝與河臣對該地河工的關切未曾停歇。在《乾隆南巡圖》第四卷〈閱視黃淮河工〉中所描繪的場景，正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時，於清口與高家堰等地視察的情況，在畫卷後半所出現的高家堰堤工場景，反映了乾隆年間對高堰大堤的修築，具有一定限度上的歷史紀實意義，與明代《水程圖》中的〈曲頭集〉以及道光年間《鴻雪因緣圖記》中的〈牟工合龍〉相互輝映。〈閱視黃淮河工〉中對河工器具的描繪也較〈曲頭集〉及〈牟工合龍〉來得豐富多樣。只是由於〈乾隆南巡圖〉第四卷〈閱視黃淮河工〉主要是依據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恭依皇祖覽黃淮詩韻〉所畫，因此在進行圖文轉譯時，基於藝術上的考量，便犧牲了對實景的考證及正確方位的探究。本文在此，欲從乾隆視察清口地區的緣起及該地區於水利河工上的重要性切入，進而擴及《乾隆南巡圖》第四卷〈閱視黃淮河工〉中對於河道工程的紀實性探究，並對圖卷中所出現的河工器具加以討論。

### 關鍵字

水利河工、清口、高家堰、乾隆皇帝、徐揚、圖文轉譯

## 前言

乾隆南巡可謂乾隆（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在位時（1735-1795）的大事，乾隆皇帝也曾言：「予御臨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sup>1</sup> 西師指的是平定清國西部的回疆，屬於軍事上的成就。南巡則達到了穩定江南社會，攏絡江南仕紳以及視察水利工程的預期目的，<sup>2</sup> 南巡所帶來的效益，堪比西師。因此在乾隆皇帝的心目當中，認為西師與南巡為在位五十年來，最重要的兩件政績。

在清初，黃河在江蘇北部奪淮河中下游河道以入海，並經常氾濫。偏偏江蘇北部為漕運重鎮，北方的糧運賴此甚深，可謂全國的經濟動脈。確保漕運的暢通，是乾隆南巡時的重點。其中，江蘇北部的清口地區由於是黃、淮、運三河的交點，也是清代治河防洪的重點區域，因此在六次南巡時乾隆皇帝皆透過南巡與回鑾往返時經過該地視察。而第一次南巡視察該地的場景，就被宮廷畫家徐揚（1712-1779 尚存）所創作的《乾隆南巡圖》第四卷〈閱視黃淮河工〉（本文以下以〈閱視黃淮河工〉稱之）所記錄。

《乾隆南巡圖》有絹、紙本兩種版本，皆為十二卷，內容大致相仿，僅有些許物件與設色以及尺寸上的差異，<sup>3</sup> 應為依照同一稿本所繪而成。<sup>4</sup> 其中絹本全套完成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sup>5</sup> 現分散於北京故宮、美國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法國魁黑博物館（The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Nice）等處，而紙本全套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sup>6</sup> 原藏於北京故宮，後撥交至中國歷史博物館，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紙本與絹本兩者間的最大差異為收藏鈐印上的不同，紙本的鈐印如「石渠寶笈」、「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以及「宜子孫」等印皆未出現於絹本版本上，若再與《石渠寶笈·凡例》中之記載「……上等者則益以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三璽」<sup>7</sup> 相

<sup>1</sup>（清）阿桂等編，《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

<sup>2</sup> 趙雲田，《乾隆出巡記》，（台北：萬卷樓，1997），頁 206-208。

<sup>3</sup> 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頁 425。

<sup>4</sup> 如聶崇正曾於其文章〈清代宮廷繪畫稿本述考〉中指出，清代宮廷繪畫基本上在正圖前均有稿本，其中在 2003 年，徐揚《乾隆南巡圖》卷二〈過德州〉及卷三〈渡黃河〉之稿本曾於北京拍賣市場中以《康熙南巡圖》稿本之名出現，引自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稿本述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13 期（2004，3），頁 75；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414。

<sup>5</sup> 《活計檔》，乾隆三十四年，如意館，Box No. 120，頁 330。參自莊心俞，〈清代宮廷畫家徐揚（1712~1779 尚存）筆下之乾隆武功〉，（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2014），頁 141。

<sup>6</sup> 《活計檔》，乾隆四十一年，如意館，Box No. 132，頁 437。參自莊心俞，〈清代宮廷畫家徐揚（1712~1779 尚存）筆下之乾隆武功〉，頁 148。

<sup>7</sup> 引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石渠寶笈》：〈<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9219>〉（2016/1/15 查閱）

對照，紙本〈乾隆南巡圖〉屬《石渠寶笈》著錄中的「上等者」，而絹本〈乾隆南巡圖〉則非，箇中差別也顯示了乾隆皇帝對絹、紙本兩者之間的喜好差異。<sup>8</sup> 徐揚在《乾隆南巡圖》的跋語中也寫道：「皇上命臣徐揚恭繪御製南巡詩意為圖十二卷。」<sup>9</sup> 揭示該圖實際上應為「乾隆南巡詩意圖」，是依照乾隆皇帝南巡路途中所創作的十二首詩之詩意繪製而成，因此全圖在創意、結構布局和每卷主題等方面，均出自乾隆皇帝一己之意，而非出自畫家個人的創意。

在中國歷代繪畫中，鮮少出現直接對於河道工程的描繪，〈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河工場景，雖然並非首創，但也相當地別開生面。是故，本文在此欲以紙本〈乾隆南巡圖〉為中心，探討〈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河工場景，探究該地區在當時水利方面的重要性，並討論當中河工的紀實性的特點與侷限，以及〈閱視黃淮河工〉的河工場景在繪畫史上是否為一特例，最後再探究該圖卷中所出現的河工器具。

## 一、「閱視黃淮河工」的緣起

〈閱視黃淮河工〉所依據的御製詩為〈恭依皇祖覽黃淮詩韻〉：

御碑亭畔匯清黃，仰溯塗山疏滄方。  
 端拱九重遑自逸，疇咨萬姓切如傷。  
 惟期繼述誠應勛，亦曰流連慎戒荒。  
 高堰重蒙皇考建，千秋淮郡倚金湯。<sup>10</sup>

展開畫卷，畫面起始於黃淮兩河之交匯，河中波浪奔騰。運河流經該地，經由惠濟、通濟、福興三閘注入淮河之後，再傾瀉於黃河之中。畫面當中，乾隆皇帝站在惠濟祠旁的閘口，立於九曲柄黃華蓋下，對跪於面前的河道總督高斌指示治河事宜，皇帝身邊侍從、臣子環繞，一架轎子停在亭前【圖 1】。過了第一道閘口，河岸兩側有許多官民面向乾隆迎跪，迎跪的官民一路綿延到第三個閘口【圖 2】。圖的左半段呈現的是用石頭所築起的高家堰【圖 3】，高家堰上的工人正忙碌地進行修築工事，在高家堰的堤外則是一望無際的洪澤湖【圖 4】。<sup>11</sup>

乾隆皇帝於〈御製南巡記〉中曾言：「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sup>12</sup> 這表明了視察水利工程是南巡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目的。乾隆在第一次南巡對清口地區水利河工的視察便被記錄於〈閱視黃淮河工〉中。實際上，在規劃南巡路線時，選定視察清口與高家堰等地區是由先遣的嚮導大臣所推薦的：

<sup>8</sup> 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425。

<sup>9</sup> 卷上題贊轉引自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413。

<sup>10</sup> (清)清高宗 撰，《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二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3)，頁 469-470。

<sup>11</sup> 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129。

<sup>12</sup> 同註 1。

嚮導大臣努三、兆惠、等奏：查江南附近御路朱家閘之引河、洪澤湖之九里岡、清口之木龍、運河閘。高郵州之東堤、南關、車邏壩、及高家堰、共八處，均關運道民生。工程緊要，仰請親臨閱視。<sup>13</sup>

清口地區位於江蘇淮安府，為黃河、淮河及運河之交匯處，也是清代治河防洪的河工重地。如在《清史稿·河渠志》中便提到：「夫黃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運亦病。是由治河、導淮、濟運三冊。羣萃於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鉅，人民田廬之頻遂受災，未有甚於此者。」<sup>14</sup> 因此，自康熙二十年代開始，歷任河道總督對於清口地區的整治便未曾停歇，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後，河道總督靳輔（1633-1692）於清黃交匯處開挖多條引河以安定運河航道。康熙二十五年（1686）開挑中引河，使得整條運河除清黃交匯處外完全脫離黃河之影響。康熙三十九年（1700）時任河道總督的張鵬翮（1649-1725）繼續加強對黃、淮、運河河道的整治。康熙四十一年（1702），張鵬翮於淮安開挖陶莊引河並擴建清口之引河，以加強洪澤湖束水刷黃之能力。乾隆二年（1737），高斌於運河增建通濟與福興二閘，以防止黃河倒灌並調節運河水量。再到乾隆五年（1740），高斌於清口架木龍五座以挑黃溜，使得整個黃河的沖刷軌跡北移，大大減低了黃河倒灌清口的威脅。<sup>15</sup> 經過康熙至乾隆百餘年間，在靳輔、張鵬翮、齊蘇勒（？-1729）、嵇曾筠（1670-1738）、高斌（1682-1755）等歷任河道總督的修建維護下，使得黃、淮、運三河交匯之淮安、清口地區的水運維持一定限度的承平。

康熙與乾隆皇帝屢次南巡至清口，便是為了親臨閱視黃淮河工，並同時指導治河工程。而這種對於水利民生的關切，在乾隆皇帝所作的御製詩〈恭依皇祖覽黃淮詩韻〉中「端拱九重遑自逸，疇咨萬姓切如傷。惟期繼述誠應勗，亦曰流連慎戒荒。」<sup>16</sup> 等句中表露無遺。

## 二、〈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河工紀實

〈閱視黃淮河工〉可分為兩半部，前半部為乾隆皇帝在惠濟等閘的視察情形，後半部則為高家堰堤工的修築情形。在清代，高堰大堤可謂首要治河重點，如康熙十六年（1677）靳輔重修於前年決口之高堰大堤，雍正（1723-1735）年間亦令戶部動工將高堰大堤增高增厚，乾隆皇帝也在第一次南巡視察清口河工後，命河

<sup>13</sup>（清）《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61，收錄於《高宗純皇帝實錄（五）：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974。

<sup>14</sup>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審定，《清史稿校註》第五冊，（台北：國史館，1986），頁3670。

<sup>15</sup> 宋兆霖等編，《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與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173-174。

<sup>16</sup> 同註10。

道總督高晉對高堰大堤加寬加固一萬七千餘丈。<sup>17</sup>

圖中所描繪的就是當時修堤的情景。進入畫卷後半段的河工場景之初【圖 5】，首先看見兩組伏役，分別由八人為一單元，手持繩索，合力蕩起一具礮，以夯實地面。旁邊也有幾位民工正在清洗因夯地所揚起的沙塵。再往左方前進，可以看見二十組兩人為一單元的民工【圖 3】，雙手持木夯，也在夯實地面。到了畫卷尾端，還可見到一長隊伍的伏役【圖 4】正在挖土、運土、堆土至堤上的場景。

在當時，這類的紀實性長卷具有錄史的功能，然而受限於體例，僅能擇要描繪皇帝南巡過程中的部分活動與行經場所，同時也會基於藝術方面的考量，而對於部分場景與事件加以強調亦或是簡化。因此這種長卷的紀實特質仍有其侷限性，無法完整呈現整個事件的過程，詳盡程度亦無法與文字文獻比擬。為突破前述之限制，乾隆皇帝之後便命大臣編纂南巡的文字記載。乾隆三十六年（1771）由高晉完成了《南巡盛典前編》，該書完成前一年正好徐揚完成絹本《乾隆南巡圖》，圖文相映，強化了「乾隆南巡」事件的具體化。之後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薩載完成了《南巡盛典續編》。乾隆五十六年（1791），阿桂（1717-1797）等人依前列二書加以增修並刪其重複而完成《欽定南巡盛典》，對乾隆六次南巡留下了完整的紀錄。<sup>18</sup>

不過這種河工紀實的繪畫作品並非由〈閱視黃淮河工〉首創，早在明代中期就有《水程圖》的這項先例。由錢穀（1509-1578）、張復（1546-約 1631）師徒合畫的作品《水程圖》三冊當中，第二冊第十五開的〈曲頭集〉【圖 6】就出現對河工場景的描繪。《水程圖》完成於萬曆二年（1574），是錢穀、張復受王世貞（1526-1590）之委託而作的一套三冊之圖冊，意在紀錄王氏於該年從家鄉江蘇太倉沿運河北上赴北京任太僕寺卿一職時的運河行旅。<sup>19</sup>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曾於萬曆四年（1576）任太僕寺卿。雖然王世貞一生當中並沒有擔任過任何與水利漕運有關的官職，但王氏出於經世致用之心，很早便認知到治河的重要性，如在其寫給瞿景淳（1507-1569）<sup>20</sup> 的書信中便提到「黃河別延浸，漫漫成巨窪，運河頓長土若平地……此咽喉也，患已剝膚矣！節鎮諸公欲望遷，為一身計，

<sup>17</sup> 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頁 133-134。

<sup>18</sup> 陳葆真，〈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顯示的意義〉，收錄於《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台北：石頭，2014），頁 97-98。

<sup>19</sup> 梅韻秋，〈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錄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6 期（2014，3），頁 113。

<sup>20</sup> 瞿景淳，字師道，號昆湖，江蘇常熟五渠人，明代官吏、文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曾任《永樂大典》的總校官。引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10681.htm>〉（2016/1/15 查閱）

則可如天下何？弟非與於此者，不忍見耳。」<sup>21</sup>

明代中葉時旅遊風氣興盛，進而帶動名勝紀遊圖冊的創作，《水程圖》雖然在體例上與當時的創作風氣相吻合，然而在取景角度上卻獨樹一幟：包含以非風景名勝的人工運河為主要場景，並且特別偏重於河閘與修堤場景描繪之特質，可說是相當地別開生面。〈曲頭集〉一圖之場景位處江蘇睢寧縣上的一處聚落，雖位處偏遠，但該處實為當時黃河南岸最容易決口的地點之一，《河防一覽》亦曰該處：「每決則民間田地一望成湖。」<sup>22</sup> 而王世貞在經過該地前，曲頭集已連年遭遇河災：

隆慶四年（1570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運道沙墊一百餘里俱為平陸，淤重儲船九百餘只。臣季馴築塞諸決河水，仍歸正道儲船盡出。<sup>23</sup>

畫面當中，可以看見穿著短衣的夫役二十餘人正在修築土堤，有的打樁、有的挖土、有的挑運土料。土堤之右上方另有兩位著長衫、戴長巾的監工。土堤後方，除了三座軍事碉堡及幾間低矮房舍外，就只剩一片黃土。這當中顯示雖然王世貞並未擔任過與漕運有關的官職，但王世貞出於經世致用以及對於漕運河工的關心，以紀程兼錄史的方式，記錄下當時修堤的場景。<sup>24</sup>

至於在〈乾隆南巡圖〉之後，清代中後期可見的河工紀實圖像中，還有道光（1821-1850）年間，曾任河道總督的麟慶（1791-1846）在其著作《鴻雪因緣圖記》中的〈牟工合龍〉【圖7】一文中的插圖得以看見。

麟慶，完顏氏，字伯餘，號見亭，滿州鑲黃旗人。清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道光十三年（1833）出任江南河道總督，自此投身治河事業。著有河工相關著作《河工器具圖說》、《黃運河口古今圖說》，此外在其自傳式的著作《鴻雪因緣圖記》中也顯示出麟慶對治河事業的關心。在〈牟工合龍〉一圖中所繪之場景為道光23年（1843），對河南中牟縣黃河堤壩因大雨所導致決口的修補：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決中牟，水趨朱仙鎮，歷通許、扶溝、太康入渦會淮。復遣敬徵等赴勘，以鍾祥為東河總督，鴻荃督工。旋以尚書麟魁代敬徵。

<sup>21</sup>（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12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09。

<sup>22</sup>（明）潘季馴，《河防一覽》，卷1，（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頁120。

<sup>23</sup>（明）潘季馴，《河防一覽》，卷5，頁382-383。

<sup>24</sup>梅韻秋，〈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錄的成立〉，頁146-150。

……恩允當於九月設局，議仍在原處接築大壩，引河內重加挑深，並於大壩下添築二壩。引河上，移建新挑水壩，仍修舊挑水壩以資擎蓋。又於上游河身坐彎處所，添挑小引溝一道，以備宣洩。十月開工。<sup>25</sup>

圖中描繪為中牟壩即將合龍前民兵動員、加緊趕工的場景。圖中正前方為即將完工合龍的大壩，左方另建有挑水壩一座，以引導主溜，減低洪水衝擊大壩，影響大壩禦洪的功能。大壩兩側停船數艘，為協助合龍工程。壩上官兵、夫役聚集，蓮燈、提燈四處張掛，顯示出治河官兵夫役正齊心全力挑燈夜戰，投入合龍工程的熱鬧景象。

除了〈牟工合龍〉外，《鴻雪因緣圖記》中對於水利河工的記載還包括了〈西湖問水〉、〈錢塘觀潮〉、〈清晏受福〉、〈信智宣防〉以及〈引河搶紅〉等項，然而這些配圖都不像〈牟工合龍〉，是直接將河道工程進行的場景描繪出來。

### 三、〈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河工器具

〈閱視黃淮河工〉與〈水程圖〉以及〈牟工合龍〉雖然皆為對河工場景紀實的圖像，然而仔細觀看畫面中的物件，可以發現在〈閱視黃淮河工〉後半段的高堰堤工場景當中，伏役們所使用的河工器具種類明顯多於〈水程圖〉以及〈牟工合龍〉。經筆者將圖中所出現的器具與專門介紹河工器具之圖書《河工器具圖說》對照後，確認畫面中伏役所使用的河工器具為礮以及木夯。此外，乾隆南巡清口地區的另一個相當重要的目的為視查該地之木龍對於疏濬的作用情況，雖然沒有被徐揚畫在〈閱視黃淮河工〉當中，但本文於此亦將木龍這項器具納入本節之討論，同時亦推測徐揚並未將木龍畫入〈閱視黃淮河工〉的原因。

#### （一）礮

〈閱視黃淮河工〉中一進入高堰堤工場景之始【圖 5】，首先會先看到兩組分別由八名伏役手持繩索，合力蕩起繩索另一端所牽起之礮，上方的一組伏役所使之礮正被盪起，下方的一組伏役所盪之礮則已落下，兩組相對照正好展示了礮這項器具的使用方法。而在麟慶《河工器具圖說》一書中〈片礮、墩子礮、束腰礮、燈臺礮〉【圖 8】一條目對礮的性質介紹如下：

堤之堅實，全仗礮工……腰礮、片礮最輕，高（高郵）寶（寶應）

<sup>25</sup>（清）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台北：廣文書局，出版年不詳），未著頁碼。

用之，蓋因人力不齊之故。至辦分長短，以長為佳，緣長則拋得起、落得重。自增堅固再礮，夫必須對手，倘十人中有一二不合適者，其築打之跡形如馬蹄。礮雖重，亦不保錐，辦工者當隨時更換也。礮質向專用石，近更有以鐵鑄者，取其沉重又礮面平整……。<sup>26</sup>

從上述說明可了解礮的作用原理。礮的主要功用，主要為敲擊土堤之地面，以增進堤防整體的堅固程度。再就地理區位而言，清口地區距高郵寶應地區不遠，所使用的礮之種類亦與高寶等地相同，為最輕之片礮。而牽起礮的繩子愈長愈好，將礮蕩起時才能蕩得比較高，礮落下時才會有比較大的重力加速度，對地面的衝擊力道比較強。礮塊大抵上以石塊做成，然至《河工器具圖說》成書的道光年間，亦有出現鐵鑄之礮塊，只是無論是石製或鐵製礮塊，皆需考慮其磨損程度而定期更換。

## （二）木夯

圖卷再往左方展開，除了可再見到零星幾名對地面灑水以及持掃把清洗地面揚起之沙塵的伏役外，還可以看到二十組由兩人手持一柱狀體的隊伍【圖3】，每組伏役皆將柱狀體抬起。經查閱《河工器具圖說》後，筆者確認該隊伏役所持之柱狀體應為木夯。木夯於《河工器具圖說》的說明如下：

字彙夯，人用力以堅舉物。《禪林寶訓》累及：『他人擔夯』亦用力之意。凡築室，必先平地，平地必須加夯。大者常七八尺，為二三尺不等，不獨河工然也。工次木夯，長四尺，旁鑿兩鼻，俾有把握，填墊窳洞、鼠穴以夯，夯之可期堅實。<sup>27</sup>

木夯並非河工專用的器具，一般在蓋房子時，若要先整平地面也會使用木夯。用於河工時，主要是考量到會有像是獾、鼠等喜歡挖地洞的齧齒類動物在土堤上挖洞，而將土質鬆動，因此得透過木夯敲擊地面的方式將這些空隙敲實。然而將〈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木夯形狀與《河工器具圖說》中〈木夯〉一條目之配圖相比較也可發現些許不同之處，在〈閱視黃淮河工〉中，木夯把手較長，且有頸身、腰身等曲線存在，形狀宛如花瓶，而《河工器具圖說》中〈木夯〉一條目之配圖【圖9】中，木夯柱體之線條則較平直，把手也比較短。

## （三）木龍及其問題

閱視木龍為乾隆巡幸清口地區的一個視察重點，主要是因為木龍在清口地區

<sup>26</sup>（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收錄於沈雲龍主編，《中國水利要籍叢編 第一集 4-5》，（台北：文海，1969），頁 102。

<sup>27</sup>（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頁 104。

的設置改變了黃河的沖刷軌跡，進而減緩了黃河倒灌清口的威脅性。在高斌奏摺中所附之〈黃河清口木龍圖〉【圖 10-1】【圖 10-2】【圖 10-3】中，可以看出設置木龍對於黃河南岸以及清口地區所發揮的保護作用。乾隆皇帝巡察清口時更為木龍作詩〈木龍〉以及詩注：

刊木遺來天用奇，淤沙禦水兩兼宜。  
密芟奚事塞橫浦，曲岸居然漲遠涯。  
鱗次常令波浪靜，蟠拿那許蝥蛟馳。  
陳堯佐創高斌繼，基奏安恬制永垂。<sup>28</sup>

木龍製如鹿角，枝梧交舞其中。編竹為嶂，置急流中，水徑過而沙見淤。宋陳堯佐創為是法，前代治河者為得其用。近河員李昞陳之總河高斌，斌用之，遂著成效。朕臨視河工，目擊其製，詩以紀之。

29

在乾隆的詩與詩註中，主要表達了木龍的功能以及流傳史。同樣的訊息也在《河工器具圖說》中〈木龍全式〉之條目中有所說明：

木龍之制，創始於宋。史載，天禧五年（1021年），陳堯佐知滑州，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堤壘埽於城北，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元賈魯塞北河口，亦曾用之。而其法初不傳，我朝乾隆初年陶莊漲灘屢挑不成，河督高文定公用州同李昞所獻圖，議照法辦，立見成效。高宗南巡閱視製詩獎勵，今南河有木龍成規一冊，李昞所刊。右外南營額設鉤手專被編紮木龍之用。<sup>30</sup>

根據乾隆御製詩以及《河工器具圖說》的敘述，木龍首見於北宋天禧五年（1021），由滑州知縣陳堯佐發明，將這種木製護欄置於河岸，有效減緩河水沖刷。元代賈魯也有用治河，後來基於不明原因失傳，至乾隆五年（1740），河道總督高斌接受幕僚李昞的建議，再次採用木龍的設置以挑黃溜，讓黃河北趨，使得黃河南岸的清口地區不會再受到黃河倒灌的威脅，而於乾隆早年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穩定，之後木龍更數次為河防官員採用。

只是，既然木龍在清口地區的水利中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那又為何沒有被徐揚畫進〈閱視黃淮河工〉中？

<sup>28</sup>（清）清高宗 撰，《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二冊，頁 470。

<sup>29</sup> 同上註

<sup>30</sup>（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頁 236。

首先，從創作時間來看，《乾隆南巡圖》絹本全套完成的時間為乾隆三十五年（1770），而紙本全套則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兩套皆距離乾隆第一次南巡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而徐揚是在乾隆第一次南巡至蘇州時，向皇帝獻畫而得以入宮，因此可以得知乾隆第一次南巡至清口地區時徐揚並未跟隨。<sup>31</sup> 而在乾隆皇帝於《乾隆南巡圖》創作前的三次南巡，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次南巡時，一方面是受限於宮廷畫家的身分，另一方面是他正奉命創作其他作品，<sup>32</sup> 因此可以確定徐揚不可能跟隨皇帝南巡。

再來，端看《河工器具圖說》中〈木龍全式〉一條目之配圖【圖 11】可以發覺其結構之複雜精細程度，若要以繪畫再現是有其困難度的，除了在高斌的奏摺中所附之《黃河清口木龍圖》中，以示意的方式簡單地畫出木龍的陳設位置與大致外觀外，基本上難以再找到其他有將木龍畫出的繪畫作品。

第三，從〈閱視黃淮河工〉所選定的地理區塊來看，就王宏鈞對該畫卷物件及方位的考證，畫卷之初乾隆所站立的位置為惠濟閘【圖 1】，河水通過惠濟閘後流入黃河，隨著畫卷向左展開，則可到運河所通過的通濟閘與福興閘【圖 2】，繼續沿著畫卷前行，便到達洪澤湖與高堰大堤之工地【圖 3】【圖 4】。<sup>33</sup> 只是若將王宏鈞所考證之標的物與麟慶所撰之《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中的〈乾隆三十年前河口圖〉【圖 12】相對照，會發覺〈閱視黃淮河工〉中的標的物之相對位置，以及相對方位都出現了很多的錯誤。筆者在對照〈閱視黃淮河工〉與〈乾隆三十年前河口圖〉後，對於畫中物件的考證如下：首先，清黃交匯處之壩口並非惠濟閘，而是清口東西壩，這可以從第二道閘口所出現的畫面中，從閘口流出之河水與另一道水系交會中看出，因此〈閱視黃淮河工〉一圖中的第二道閘口才是惠濟閘，並依序下去可在看到通濟閘，而福興閘並未被畫入〈閱視黃淮河工〉當中。另外，洪澤湖與高堰大堤的方位，也與運河閘口的方向順序完全相反。從上述跡象顯示，徐揚顯然對《乾隆南巡圖》的創作是以依照詩意為優先，次而考量畫面構圖配置等藝術上的布局，而犧牲掉對於正確物件相對位置的考證。只是，無論〈閱視黃淮河工〉是否有依照實景而畫，其所選取的範圍，顯然並不包括木龍所設置的黃河南岸，畢竟〈閱視黃淮河工〉所依據的〈恭依皇祖覽黃淮詩韻〉與為木龍而作的〈木龍〉，分屬不同首御製詩，彼此內容互不概括，再考量到徐揚創作《乾隆南巡圖》，主要是依據乾隆御製詩進行圖文轉譯，因此對於當地的實景以及視察當地的目的之考究並非徐揚在創作時的優先考量。

<sup>31</sup> 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4 期（2009，3），頁 264。

<sup>32</sup> 如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時，徐揚正奉命創作《盛世滋生圖》，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時，徐揚已上呈《聖謨廣運萬國來朝圖》之畫稿並奉旨准畫，到了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時，徐揚已投身進入《南巡圖》的創作任務中。參自莊心俞，〈清代宮廷畫家徐揚（1712-1779 尚存）筆下之乾隆武功〉，頁 112-137。

<sup>33</sup> 同註 11。

## 結語

「閱視黃淮河工」為乾隆南巡時對清口地區的視察重點，由於黃河的變動因素以及容易決堤等特性，早在清代初期時，皇帝與河臣們都對該地區的治理費盡心思。到乾隆第一次南巡前，即便清口地區在當時已經進入相對穩定承平的時期，乾隆皇帝以及河道總督高斌對該地的治理仍然不敢鬆懈，直至乾隆皇帝往後幾次南巡時，對該地的水利建設都有所指示，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開挖陶莊引河，以及乾隆五十年（1785）在原有的東清東西壩外增建禦黃東西壩。<sup>34</sup> 因為清口地區為運道之咽喉，攸關全國漕運之命脈，因此乾隆六次南巡往返時都會至該地進行視察。同樣地，這種關心也反映在乾隆皇帝命徐揚創作《乾隆南巡圖》時，選定〈恭依皇祖覽黃淮詩韻〉為徐揚創作依據的十二首詩之一，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絹本與紙本《乾隆南巡圖》中的第四卷〈閱視黃淮河工〉。清口與高家堰地區為河防重地之特質，使得在畫面中，出現了諸如碓以及木夯等河工器具，讓後世得以一覽當時的河道工程概況，具有水利史上的價值。只是，徐揚在依據詩文進行轉譯時，考量到長卷的形制、詩文的內容以及對皇帝功績的禮讚，在佈局整體畫面構圖時，便犧牲了對實景與方位的考證，並捨棄對部分較複雜河工器具之描繪。換言之，該卷在繪製時，會優先基於藝術上的考量，刻意地強調或是弱化對某些現象或事件的描寫，對於乾隆皇帝視察清口地區的紀實性仍無法與文字記載相比擬，這或許是為什麼乾隆皇帝對南巡一事的文字紀錄也相當重視，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四十九（1784）年以及乾隆五十六年（1791）先後命高晉、薩載以及阿桂等人先後編輯《南巡盛典前編》、《南巡盛典續編》和《欽定南巡盛典》的原因之一。

<sup>34</sup> 宋兆霖等編，《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頁 174。

## 參考資料

### 古籍資料

1.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 125,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8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2. (明)潘季馴,《河防一覽》,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
3. (清)阿桂等編,《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上,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4. (清)清高宗 撰,《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二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3。
5. (清)《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361,收錄於《高宗純皇帝實錄(五):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6。
6. (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收錄於沈雲龍主編,《中國水利要籍叢編 第一集 4-5》,台北:文海,1969。
7. (清)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台北:廣文書局,出版年不詳。

### 中文專書

1. 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
2. 宋兆霖等編,《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3.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審定,《清史稿校註》第五冊,台北:國史館,1986。
4. 陳葆真,《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台北:石頭,2014。
5. 趙雲田,《乾隆出巡記》,台北:萬卷樓,1997。

### 期刊論文

1. 馬雅貞,〈中介於地方與中央之間:《盛世滋生圖》的雙重性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4 期(2009,3),頁 259-322。
2. 梅韻秋,〈明代王世貞《水程圖》與圖畫式紀行錄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6 期(2014,3),頁 109-175。
3.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稿本述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113 期(2004,3),頁 75-91,159。

### 學位論文

1. 莊心俞,〈清代宮廷畫家徐揚(1712-1779 尚存)筆下之乾隆武功〉,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2014。

### 網頁資料

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石渠寶笈》:

- <<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9219>> (2016/1/15 查閱)
2. 百度百科，瞿景淳：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681.htm>> (2016/1/15 查閱)

## 圖版目錄

- 【圖 1】徐揚，《乾隆南巡圖》卷四〈閱視黃淮河工〉(局部)，1776，紙本設色，68.6×1106.5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來源：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頁 62。
- 【圖 2】徐揚，《乾隆南巡圖》卷四〈閱視黃淮河工〉(局部)，1776，紙本設色，68.6×1106.5 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來源：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頁 66。
- 【圖 3】徐揚，《乾隆南巡圖》卷四〈閱視黃淮河工〉(局部)，1776，紙本設色，68.6×1106.5 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來源：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頁 70。
- 【圖 4】徐揚，《乾隆南巡圖》卷四〈閱視黃淮河工〉(局部)，1776，紙本設色，68.6×1106.5 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來源：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頁 71。
- 【圖 5】徐揚，《乾隆南巡圖》卷四〈閱視黃淮河工〉(局部)，1776，紙本設色，68.6×1106.5 cm，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版來源：王宏鈞，《乾隆南巡圖研究》，北京：文物，2010，頁 69。
- 【圖 6】錢穀、張復，《水程圖》(中冊曲頭集部分)，1575，紙本設色，25.1×38.4 cm，台北故宮藏。圖版來源：  
<<http://painting.npm.gov.tw/getCollectionImage.aspx?ImageId=567861&r=32189497975>> (2016/01/15 查閱)。
- 【圖 7】麟慶，《牟工合龍》，1849。圖版來源：(清)麟慶，《鴻雪因緣圖記》，台北：廣文書局，出版年不詳，未著頁碼。
- 【圖 8】麟慶，《片礮、墩子礮、束腰礮、燈臺礮》，1836。圖版來源：(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收錄於沈雲龍主編，《中國水利要籍叢編 第一集 4-5》，台北：文海，1969，頁 101。
- 【圖 9】麟慶，《木夯》，1836。圖版來源：(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收錄於沈雲龍主編，《中國水利要籍叢編 第一集 4-5》，台北：文海，1969，頁 103。
- 【圖 10-1】高斌，《黃河清口木龍圖——雍正十三年》，1749，紙本設色，58.5×86.3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宋兆霖等編，《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頁 52。
- 【圖 10-2】高斌，《黃河清口木龍圖——乾隆十三年》，1749，紙本設色，58.5×86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宋兆霖等編，《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頁 53。
- 【圖 10-3】高斌，《黃河清口木龍圖——乾隆十四年》，1749，紙本設色，57.8×87 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宋兆霖等編，《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檔案輿圖特展》，頁 53。
- 【圖 11】麟慶，《木龍全式》，1836。圖版來源：(清)麟慶，《河工器具圖說》，收錄於沈雲龍主編，《中國水利要籍叢編 第一集 4-5》，台北：文海，1969，頁 235。

【圖 12】麟慶，《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乾隆三十年前河口圖》，1840。圖版來源：  
（清）麟慶，《黃運河口古今圖說》，收錄於沈雲龍主編，《中國水利要籍叢編 第一集 4-5》，台北：文海，1969，頁 29-30。

